

· 史学理论与方法 ·

## 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困境与出路 ——民间历史研究者的挑战与史家责任的重新审视

丁 诺 舟

[摘 要] 日本的学院派史学自形成之日起至今,一直坚持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在今日呈现出诸多弊端,使得学院派史家无法承担起“普世”与“经世致用”的职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民间史家”应运而生。他们在研究与著作风格上与学院派史家存在明显差异,代替学院派史家承担起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逐渐控制了历史知识领域的话语权,对日本民众历史认识与历史观具有极大影响力。学院派史家与民间史家均有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互相取长补短,在竞争中互相促进是日本史学发展的最佳途径。改进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勇于承担历史学家“求真普世”“学以致用”的职责。

[关键词] 日本;民家史家;史家责任;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7)10-0108-10

### 一 “学院派史学”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确立与缺陷

自日本在国立大学设置史学科,日本“学院”史学研究起步之初,源自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便被奉为金科玉律,严格遵守实证主义至今是日本史学界的骄傲。随着中国学者对日本历史研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优势与问题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知。孟明铭探讨了兰克史学对日本近代历史学发展的影响,认为兰克史学传入日本,既顺应了日本史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又与当时日本的实际国情相契合<sup>①</sup>。张经纬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移植生根和传播发展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短期战胜实证主义,成为日本史学主流思想的原因<sup>②</sup>。张跃斌从历史认识问题出发,提出日本实证主义史学存在“禁地难入、过犹不及、以假害真”的三重困境<sup>③</sup>。然而,既往研究往往只关注日本的“官方”史学,至今尚无学者注意到日本民间历史研究者的存在与影响。探寻日本民间史家的形成轨迹,剖析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民间史家对日本学院史学与社会的影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日本学院史学界所秉承的实证主义并非日本本土的史学思想,而是在明治时代的西化浪潮下,引入日本的众多学术思想之一。1887年,兰克的弟子路德维希·利斯被东京帝国大学聘为史学科讲师,前往日本系统性地传授实证主义史学。接受其指导的众多学生此后成为大学的历史教师,将利斯的实证主义方法传播到了日本各地。1888年东京帝国大学以重野安绎为中心设置了国史学科,1889年重野在利斯的指导下创立了“史学会”,日本的学院派史学体系从此确立<sup>④</sup>。

在日本史学研究体系的构建中,利斯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这使实证主义成为日本史学研究的根基。此后,桑原鹭藏、内藤湖南等史家利用日本固有的史学研究方法,改造并完善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使之更适合日本的史学研究特点,从而发扬光大了实证主义史学。直到今日,实证主义仍然是

① 孟明铭:《对近代日本史学发展的再探讨——以日本“兰克学派”的兴起为例》,《学术探索》2015年第6期,第129~133页。

② 张经纬:《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第61~71页。

③ 张跃斌:《实证主义在日本的困境和没落》,《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第44~47页。

④ 道重一郎:“战后历史学和宏观史学的可能性”(道重一郎,“戦後歴史学と大きな歴史像の可能性”),《东洋大学人文科学総合研究所纪要》(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第9期(2008年3月),第36~37页。

日本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最基本准则。日本各大学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课程中,均会涉及实证主义史学在日本扎根与发展的过程。得以亲身受教于兰克门人,将实证主义确立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可谓日本史学界的骄傲。

历史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历史观”与“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中又包括史料筛选方式、史料批判方法、史料解读方法等。从明治时代到今天,日本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观”随着时代与国家需求而千变万化,但研究历史的方法却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始终贯彻着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进行严密的史料批判,确定客观事实。史家的责任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记录历史,而非从历史中寻找规律。换言之,大部分的日本历史研究者坚持追求史料的真实性,在历史观上却常为时局左右,罕能坚守实证主义历史观。他们常为迎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忽视推理逻辑与研究结论的合理性,得出荒谬的历史结论。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前和战中尤为明显。

二战期间,皇国史观被提升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泛滥于史学领域。学院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压制,寻找史料宣传皇国思想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然而,历史研究者们对皇国思想的宣传与论证,仍然是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史料筛选与史料批判基础之上。“历史观”与史料的解读方法纵然荒谬,使用的史料却真实可靠,这是日本史学研究最为扭曲的时代。

战后,皇国史观迅速瓦解,学院派实证主义史学迅速得以重建。但此时,历史学界基于对战时历史研究的反思,开始极力推崇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皇国史观类似,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日本史学界的影响虽深,但仅仅局限于“历史观”。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学院史学的影响相对较小,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为基础的大塚史学是极好的例证。大塚久雄编写的《西洋经济史讲座》在历史观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提出“要想理解明治维新以后,我国(日本)的经济发展(即所谓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特质,就必须找到其世界史上正确的坐标”<sup>①</sup>。以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为鉴,寻找日本近代发展走向歧路的根源,这是对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否定。实证主义史观反对进步史观和历史法则论,禁止为寻找“历史规律”而恣意增删史料。兰克认为历史是“一次性事件”的连续,不存在普遍性、绝对性的历史法则<sup>②</sup>。如果说真的存在这种法则,则此法则必须是包含人类文明的全部要素的、极为复杂的概念,只要不能探明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要素,就不可能构筑普遍性的历史法则。研究者有可能根据历史研究而得出某些“倾向性法则”,但这种“法则”不过是貌似法则的假说<sup>③</sup>。大塚史学承认了历史发展存在普遍规律性,无疑是对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反叛。但是,大塚久雄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筛选方法仍然遵循着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这种二元式历史研究是战后日本学院史学的突出特色。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战后历史学界迎来了转折点”<sup>④</sup>。变革的火种起自西洋史学界,法国近世史学者二宫宏之翻译并介绍了兴起于欧洲的年鉴学派及社会史研究动向。1978 年网野善彦出版了极具年鉴学派风格的著作《无缘·公界·乐》,1982 年德国史学者阿部谨也、社会思想史学者良知力、人类学学者川田顺造创立了《社会史研究》杂志,年鉴学派与社会史研究迅速传遍了日本西洋史学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年鉴学派和社会史学不仅对日本西洋史学界的“历史观”造成了冲击,更对研究方法“史料观”产生了影响。被实证主义认为不可“实证”的人的“心性(mentalités)”开始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严格的史料批判之外,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被引入了史学研究。

然而,年鉴学派给日本的西洋史学界带来的冲击极大,对日本史研究领域却影响甚微,这一差异与日本历史学科设置的格局有关。国立大学中初设史学科之时,日本政府人为地将史学研究划分成

① 大塚久雄:《西洋经济史讲座》第 1 卷(大塚久雄,西洋经济史講座第 1 卷),东京:岩波書店 1960 年版,第 4 页。

② 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Ranke, *Preface: 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from 1494 - 1514*),纽约:Vintage 出版社 1973 版,第 57 页。

③ 理查德·伊万斯:《为历史辩护》(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伦敦:格兰塔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 页。

④ 道重一郎:“战后历史学和宏观史学的可能性”(道重一郎,“戦後歴史学と大きな歴史像の可能性”),《东洋大学人文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第 9 期(2008 年 3 月),第 39 页。

东洋史、西洋史与日本史三大领域。这奠定了日本历史研究“三史独立”的基本格局，每一个领域的研究者都缺乏其他两个领域的相关知识，这一格局对日本学者的研究风格造成了深远影响。需要与欧美学者同台竞技的西洋史学者饱受一手史料不足之苦，因而对史学研究的新潮流更加敏感，却较少采用日本一方的史料进行交叉研究弥补缺陷；日本史学者坐拥众多珍贵史料，却往往固步自封，缺乏专门领域之外的知识，对其他史学界的新动向也不甚敏感。

年鉴学派与社会史研究在日本的不平衡发展正是拜“三史独立”的格局所赐。《社会史研究》的编辑者主要是西洋史学者，没有日本史学者，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虽为此杂志执笔，却并未担当其他业务<sup>①</sup>。风靡 20 世纪 70 年代的年鉴学派史学未能给日本史研究界带来根本性转变，实证主义史学坚守了日本史阵地。即便是西洋史学界，年鉴学派带来的新研究法也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性地位。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19 世纪以来的进步主义史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被动摇，进步史观的衰落导致“近代化”的优越性遭到打击。历史单线发展论的否定、民族国家价值的相对化、社会史研究主题的不断细化，这些新变化都给实证主义史学留下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日本史学界再度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纵观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的史学研究可以发现，在缺乏如皇国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一般强有力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学院派史学总会自发地回归实证主义。虽然实证主义的“历史观”不断受到挑战，研究热点持续变化，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特别是“史料观”极少受到冲击。即便是在各种新史学流派层出不穷的 20 世纪中后期，以史料为绝对的研究中心，一切从史料出发依然是日本史学界的根本态度。大阪大学的历史学者向来以积极引进新史学方法而著称，如“全球史”“大历史”等理念，但其引进的不过是新的历史观，史料批判方法从未真正脱离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从实证主义史学传入日本，至今已历时 130 余年，利斯传授的史学方法精髓一直保留至今天。

实证主义史学虽然几经冲击，却长期指导着日本历史研究发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其科学、合理之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日本的社会需求在百年间不断变化，世界范围内的史学研究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一成不变的实证主义史学已经呈现出诸多弊端与不足之处。

首先，“求真”与“普世”是历史研究的两大基本职责。“求真”要求历史学家获取、掌握可靠的史料，通过史料批判，对历史事实进行还原，摒除稗官野史。“普世”则要求将历史事实、历史理论甚至历史哲学普及给一般民众，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历史认识，承担历史学家的社会职责。日本的历史学研究者往往忙于“求真”，却疏于承担“普世”责任。

在历史知识普及中，只有兼顾内容的趣味性和文章的可读性，才能吸引民众兴趣。然而，实证主义研究法以史料为中心，反对过度推理与演绎，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从史料中总结升华出普遍性的理论或有启迪性的规律，这就使得研究内容过度关注细枝末节，研究主题极度狭窄。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证主义在日本的学院派史学界已蜕变为“史料至上主义”，学院派史家在面对明显不符合情理，或无论如何都不符合逻辑的历史记载时，只要史料经过了实证主义史料批判，被确认可信度较高，就会将之认定为历史事实。简言之，日本史学家拘泥于史料，而“缺乏常识”<sup>②</sup>。结果是“学院派”的研究内容与民众的现实生活相距遥远，极少涉及民众感兴趣的历史话题，因而很难引起民众的关注或共鸣。

同时，实证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论文重视对史料的分析与批判，著者在引用史料时必须对该史料的可信度进行说明，这就牺牲了叙述的流畅性与逻辑的连贯性。这一写作习惯被带到了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中，出自学院派史家之手的畅销历史普及读物《武士的家用帐》一书中，同样充斥着对史料获取手段、史料价值的探讨，使得文章的叙述逻辑经常出现中断，影响了可读性。

其次，实证主义史学将史料作为研究的中心，而史料往往是繁杂琐碎的微观数据集合，使学院派史家高度专注于微观研究，造成了史学研究的过度专门化与孤立化。学者往往精深于某一具体问题，

① 阿部谨也等：《社会史研究创刊号》（阿部谨也等，社会史研究创刊号），东京：日本编辑学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0 页。

② 井泽元彦：《“常识”的日本史》（井泽元彦，「常識」の日本史），京都：PHP 研究所 2009 年版，第 9~12 页。

却不能跳出自己的研究课题,从更加广阔的角度观察历史,因而不能合理地解释历史现象,更无法探寻历史规律。日本史、西洋史、东洋史“三史独立”的格局更是加剧了这一倾向。学院派历史研究者往往只了解自己的“专门史”,不但缺乏另外两个史学领域的知识,更加缺乏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知识。在新史学研究中,综合使用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知识进行历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严格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限制了学院派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与思维,使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细碎的史料海洋中迷失了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探求,而在缜密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对历史规律、历史理论进行合理性探索不仅是历史研究的责任,更是国家、社会的需求。

在当今世界,日本史学界可谓死守纯粹实证主义研究的最后堡垒,这使其陷入文化孤岛的窘境,外国的研究理念与成果无法影响日本,日本的研究成果在外国则多被当作史料进行引用,缺乏历史观点的碰撞。有关日本的历史资料多数保存于日本,而日本社会各界又极为重视史料的保存与整理,这本可使日本成为全世界日本史研究的中心与信息交流的枢纽。但是,日本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美国、中国等国的学界格格不入,过度重视历史细节,缺乏对历史本身的价值判断与反思。无论学界内外,国际间有关历史问题的对话往往不在同一层面,不但限制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有效性与合作的可能性,而且阻碍了共同历史认识的达成。

最后,日本的“学院派”历史学者的研究课题与国家、社会的需求脱节,学术研究本身沦为学者和学界自娱自乐的工具,极少向政府提出正确的历史观,或有益于国家战略发展的历史研究成果。虽然并非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必须追求“经世致用”,但整个日本史学界均陶醉于学究式的实证主义考证,疏于向政府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其结果是政府无法看到大学等高等研究机构中史学研究的实用价值,不断削减史学学科的研究经费。2015年6月,文部科学省发布《重新审核国立大学法人组织及业务通知》<sup>①</sup>,80%的国立大学文科都面临改组、缩小,乃至撤销的危机。在国立大学文科的大清洗中,史学科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学院派史学研究开始面临生存危机。学院史家们疏于向政府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与基于历史的战略指导,迫使政府聘请“御用”研究者进行服务于国家的历史研究。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历史研究往往走到了“学院派”历史研究的对立面,过度重视实用性,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当前,日本政府无法正确认识历史问题,与中韩等国屡屡发生冲突,这些御用研究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兰克的故乡,实证主义史学早已发生了变化,历史研究法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在日本,实证主义却深深扎根于史学界,使“学院派”史学难以满足民众、政府和国际交流的需求。如供求市场一般,当刚性需求存在时,市场会自发地孕育出供给方,填补市场空白。在“学院派”史家放弃履行社会责任之时,一支新的史学研究力量应运而生。这支力量在日本被称为“在野史家”,即“民间”历史研究者。在今天,日本的“民间”历史研究者已经成为满足民众、政府历史知识需求的主体,他们通过大众传媒掌握了历史知识的“话语权”,替“学院派”史家承担起了“普世”与“经世致用”的职责,对民众历史认识的塑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 二 “民间”历史研究的滥觞与飞跃

诞生于明治时代的“历史小说家”是“民间”历史研究者的雏形。历史小说通常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故事情节必须基本符合历史原貌,虽然在细节上存在虚构和夸张,但极度忌讳违背历史常识的虚构,强调保持时代感。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往往是作家为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感动,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解读该段历史。作家个人的理念与历史认识会借登场人物之口传递给读者,因此历史小说通常带有较强的历史评论色彩。这就明显区别于将舞台设定在某一时代,为追求趣味性而随

<sup>①</sup> 文部科学省:《重新审核国立大学法人组织及业务通知》[文部科学省,国立大学法人等の組織及び業務全般の見直しについて(通知)],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koutou/062/gijiroku/\\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16/1358924\\_3\\_1.pdf](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koutou/062/gijiroku/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16/1358924_3_1.pdf), 2015年6月8日/2016年10月30日。

意虚构、删改历史的“时代小说”<sup>①</sup>。在明治时代之前,日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虽然盛行于江户时代的“讲谈”也有涉及历史,但内容多为民间历史传说,缺乏历史小说的思想性与对历史原貌的尊重。

虽说明治时期尚无专门撰写历史小说的作家,但具有历史小说特性的作品已经问世。岛崎藤村晚年的大作《黎明前》是该时期历史小说的翘楚,作品以微观的视角,细腻地描绘了从佩里来航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变化。森鸥外不但撰写了大量历史小说,而且发表了文论“历史的原貌与超脱历史”<sup>②</sup>,论述了历史小说创作应当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尊重历史原貌。

进入昭和时期后,以历史小说为专业的作家开始出现,历史小说从题材到创作风格都开始明显区别于一般小说。吉川英治是昭和前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小说家,其代表作《宫本武藏》描绘了以“剑禅如一”为目标,在困境中不断探求自我的剑豪形象。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这一形象与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奋发图强的日本相重合,满足了战时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与民众的心理诉求,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引起了空前的社会共鸣,为此后历史小说的风靡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出于战争需要,“战记小说”蓬勃发展。战记小说主要以日本陆、海军的战斗记录与战争新闻报道为素材,宣传日本军队的“丰功伟绩”,在军方的支持下逐渐发展为历史小说的重要分支,代表性作品有寺岛枢史的《日本海军战记怒涛》。

昭和前期,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历史小说与日本的国家需要联系紧密,从题材到描写手法都带有明显的皇国史观,沦为政府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然而,国家的支持从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小说的发展,作家人数大幅上升,历史考证愈加严密,出版社积极出版历史小说,民众也对历史小说充满阅读兴趣<sup>③</sup>。这些要素成为历史小说飞速发展的基础。虽说历史小说家本着尊重历史原貌的态度撰写作品,但其历史知识大多源自学院派学者的著作,缺乏独立的历史研究。因此,这一阶段的历史小说不过是在正确的历史架构下进行的文学创作,而非对历史本身进行研究与思考,停留于此阶段的历史小说家们尚称不上“民间历史研究者”。

将文学创作上升为学术研究,为“民间历史研究”奠定基础的,是活跃于战后的两位巨匠,吉村昭与司马辽太郎。吉村昭将严格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法带入历史小说创作中,与学者同样独立阅读史料,严密地考证历史事实,最后将研究成果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提供给大众阅读。吉村昭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记录小说”这一全新的小说类别。撰写记录小说不仅需要整理、分析史料,而且要展开实地考察,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在真伪批判之后,以不包含任何主观情感的笔触进行叙述。《战舰武藏》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了撰写此书,吉村昭几乎穷尽了书面史料,并亲自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在严密验证资料真伪的基础上,仅将“事实”写入书中,从而在历史真实性上,将“民间”历史研究提高到学院派史家的高度。

吉村昭的历史求真精神始终不曾动摇,20世纪80年代之后,吉村昭停止了记录小说的撰写,理由是“大多数的当事人均已离开人世”<sup>④</sup>,无法对历史进行实证,自然无法撰写记录小说。此后,吉村昭开始以近代之前的日本作为创作的主舞台,撰写历史故事。虽说不是记录小说,但他对历史细节准确性的执着有增无减。如果作品以江户时期某一地区为舞台,吉村昭就会参考旅行商人的日记,确定该地区在故事发生时是何种天气<sup>⑤</sup>。

虽说吉村昭的历史研究方法并没有超越实证主义史学的桎梏,但他的突出贡献在于改变了叙事

① 乡原宏:“司马辽太郎の文学——从时代小说至历史小说”(郷原宏,“司馬遼太郎の文学——時代小説から歴史小説へ”),《国文学:解释和教材的研究》(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54期第8号,2009年6月,第48~55页。

② 森鸥外:《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束缚》(森鸥外,歴史其儘と歴史離れ),[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129/files/684\\_18395.html](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129/files/684_18395.html),1998年3月30日/2016年10月30日。

③ 岩本则子:“战时报告书分析:转化与传播的形式”(Iwamoto Noriko,“The Analysis of Wartime Reporting:Patterns of Transitivity”),《爱丁堡应用语言学研究》(Edinburgh Working Papers in Applied Linguistics)第6期(1995年),第58~68页。

④ 桑原文明:《吉村昭资料集》(桑原文明編,吉村昭資料集2),东京:吉村昭研究会2015年版,第18页。

⑤ 野口武彦:“关注历史(悼念吉村昭)”(野口武彦,“歴史への気配り(追悼吉村昭)”),《文学界》第60卷第10号(2006年10月),第186~189页。

方式与选题倾向,让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能够普及给民众。吉村昭文笔流畅,作品通俗易懂,即便是记录小说《战舰武藏》《关东大地震》也毫无晦涩无趣之感。他凭借记录小说多次摘得菊池宽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同时,吉村昭善于选取一般民众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刺激民众的历史求知欲,其撰写的多部作品都成为了畅销书籍,在题材的选取上远比学院派史家更受民众欢迎。

与出身“民间”,却坚持实证主义的吉村昭不同,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将“史观”带入历史创作,使民间历史研究与学院史家从根本上分道扬镳的是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重视历史的连续性与历史人物的个性,不仅追求宏观把握历史进程,探求历史发展规律,而且敢于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司马辽太郎的作品充斥着强烈的历史批判精神,研究者将这一精神总结为“司马史观”。“司马史观”极度推崇理性主义,将明治时期与昭和时期置于绝对对立的两个极端,认为明治维新将一个封建国家改造成理性主义的近代国家,但昭和时期的日本却丧失了理性,进入了黑暗时代。

这一史观直接影响了司马对作品题材的筛选。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多以战国、幕末和明治时代为舞台,几乎没有以昭和时代为题材的作品。司马坚持小说的主人公必须拥有理性主义思维,头脑明晰,而明治时代因为有这样的人而充满活力。既不同于追求娱乐性的历史小说,也不同于吉村昭的传记小说,司马辽太郎的小说是其史观的载体。为了表明自己的史观,司马极力避免过度的人物心理描写,不去挖掘历史人物的个性,而是反其道行之,通过人物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来进行人物塑造,将人物单纯化、代表化。司马小说的主旨不是刻画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而是将“司马史观”推崇的人生道路展现在读者面前,对读者的历史认识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司马辽太郎活跃于战后,正值学院史学界盛行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之际。学院史学既否定战前的一切事物,又缺乏对未来的合理化设想,沉浸在对战败原因的反省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史观”将战前分为“健康明快”的明治与“黑暗畸形”的昭和,将明暗的分界线归结为“理性主义”,只要坚持“理性主义”,重塑明治时代的风气,日本就可以从思想上走出死气沉沉的“战后”时代。对于承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打击的日本民众来说,“司马史观”不仅重振了大和民族的历史自信,而且指出了未来的努力方向,满足了民众迫切的内心需求,使得司马辽太郎的作品深受民众喜爱,“司马史观”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之中。

司马辽太郎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历史小说为主,借主人公的行为与言语表达“司马史观”;第二阶段则转攻历史/文化评论,更加旗帜鲜明地运用理性主义审视历史。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历史评论,借古说今,追求历史研究的“经世”意义是司马辽太郎不变的主旨。虽说如此,司马辽太郎并非不重视历史的真实性。虽然不像吉村昭那样执着于一手史料,但司马在动笔之前也会收集大量的史料与学者著作,其作品描绘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同样得到了较高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司马史观”与司马辽太郎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均有值得商榷之处。“司马史观”强调的理性主义缺乏必要的客观性与道德价值判断<sup>①</sup>,作品中对历史的误读与虚构也屡屡遭到批评。但是,司马辽太郎通过史观的塑造与宣传,在实证主义史学之外,找到了历史研究发展的新天地。晚年的司马辽太郎更是凭借《明治这个国家》《昭和这个国家》等既不同于历史论文,又非历史小说的独特文体,定义了“历史评论”的著述范式,对后世历史评论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吉村昭与司马辽太郎从不同的角度为历史小说创作注入新要素,孕育了兼备历史事实的准确性、通俗易懂的普世性与高屋建瓴的历史批判精神的全新史学流派,即民间历史研究。民间史家们较少受大学制度与学界规范的约束,选题与文体都更加自由,其作品为一般读者喜闻乐见。追求作品的普世性并不意味着民间史家的研究水平低下,即使是学院派史家也会将民间历史研究者的著作作为二手史料进行引用。白井明雄撰写的《日本陆军“战训”研究大东亚战争期间“战训报”分析》就引用了大冈升平的战记文学作品《雷伊泰战记》<sup>②</sup>。在司马辽太郎过世 20 年后的今天,民间史学研究已经进入

① 杨栋梁、杨朝桂:《在“理性”的名义下:“司马史观”新探》,《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第126~138页。

② 白井明雄:《日本陆军“战训”研究大东亚战争期“战训报”的分析》(白井明雄,《日本陸軍「戦訓」の研究大東亜戦争期「戦訓報」の分析》,东京:芙蓉书房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291页。

成熟期。民间史家的影响力俨然已超过学院史家,成为民众、甚至政府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

### 三 “民间史家”的研究与著作风格

在日本,历史作家、历史评论家都属于“纪实作家”。纪实作家的主要工作是调查记录档案、访谈录等资料,以文章或纪录片的形式,如实记录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文学家不同,“真实性”是纪实作家的灵魂,因此调查取证的严密程度与资料筛选的公允性往往是评价纪实作家水平的重要标准。历史作家与历史评论家是历史领域的“纪实作家”,其作品的主题一般是历史问题。历史作家偏重于深挖历史事件的细节,阐明真相,摒除稗官野史,继承了吉村昭的衣钵;而历史评论家则注重对历史的思考,敢于剖析历史事件与人物,探寻历史规律,弘扬了司马辽太郎的传统。历史作家与历史评论家的界限相对模糊,有的作家更是身兼二职,因此往往将此二者统称为“民间史家”。他们远离大学组织与史学界的各种束缚,长期“在野”进行自由研究,其研究风格迥异于学院派史家。

第一,著作丰富、作品涉及面广泛是民间史家的突出特色。年龄、知名度相近的学院派史家与民间史家相比,民间史家在著作数量上往往多于学院派史家。现当红历史评论家井泽元彦的历史著作近120种,作品几乎涉及日本历史的各个时期,其中《逆说日本史》系列现刊行22卷,每卷500余页。主攻古代史的美裕二、主攻社会文化史的尾崎秀树著作均逾百种,且在自己主攻的领域之外也均有著述。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容包罗万象的著作群,使民间史家掌握了纸质媒体领域的话语主导权,扩大了其影响力。

不可否认,民间史家不承担教学任务,不插手大学或学会的行政事务,可以节省出大量时间投身研究与写作。但是,研究、著述方式的不同是造成民间史家与学院派史家产量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实证主义的指导下,学院派史家在解读史料之后,往往止步于局部历史事实的还原,只客观叙述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缺乏规律性信息的抽取与历史理论的升华。民间史家则明显不同,他们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同样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但在分析、评判历史事件之时,也从不忌讳代入本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这一特征早在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中就有体现。在历史研究中,收集、解读、整理史料是最为消耗时间与精力的工作,实证主义严格的史料批判方法尤其是如此的。与此相比,在史观与评价历史的思维范式相对成型的状态下,评点历史,经世致用可谓水到渠成之事。不敢越出“客观性”雷池一步的学院史学家在效率上处于不利地位。

学院派史家专精于本领域,缺乏研究其他领域的热情,这构成了其著作偏少的另一因素。民间史家往往涉猎面较广,可以从各历史时期寻找写作素材。与此相比,学院派史家需要花更多时间寻找自己研究领域的新突破点,这一探寻过程往往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一步降低了学院派史家的工作效率。

同时,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的出版社都极为重视出版物的销量,不被读者认可的作品很难出版。学院派史家的作品不单题材过度专业,而且充斥着长篇累牍的史料批判。行文过度追求实证主义逻辑而忽视可读性,结尾之处又往往就事论事,缺乏发人深思的点睛之笔。历史学界的论文写作规范并不适合一般大众的阅读市场,很难为一般读者接受。与此相比,民间史家不拘泥于自己的专精领域,往往选择民众感兴趣的时代与话题,研究虽然深入却不晦涩。井泽元彦的《逆说日本史14近世成熟卷》用了300余页的篇幅,全面剖析“忠臣藏”事件的真相,研究的细致深入程度并不逊于学院派史家。由于“忠臣藏”事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历史谜案,民众均希望了解其真相,并不在意作品的篇幅长短,加之井泽元彦文笔轻快,娓娓道来,因此虽然考证细碎、篇幅冗长也不缺乏市场,很快成为了畅销书,《逆说日本史》系列的连载至今仍在继续。在吸引读者与出版社的竞争中,民间史家占据明显优势。

上述原因共同造成了学院派史家与民间史家著述量的差异。虽说历史研究竞争首先要看“质”,但在满足民众求知欲、争夺话语权问题上,“量”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民间史家的作品占据了书店的大半江山,学院派史家面向一般民众的著作却寥寥无几,涉及面也相对有限,不能全面满足民众对历史的求知欲,未能承担起历史学家应尽的“普世”职责,其社会影响力自然不断降低。学院派史家在纸质媒体出版领域的话语权不断萎缩,自发地为民间史家让出了活跃的舞台,客观上促进了民间历史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民间史家重视利用电视、网络传媒,积极在各种节目中露面,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日本的电视节目经常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出席,讲解节目内容或背景知识,历史学家还可以在介绍史实之外,相对自由地介绍自己对该历史事件的分析与评价,是宣传自身史观的绝佳舞台。在这些节目中频频出场的,往往是民间史家。由于电视节目的收视者是缺乏专业知识的一般民众,因此需要解说历史知识相对浅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学院派史家不积极登场的原因。但是,学院派史家与民间史家的薪酬结构是造成这一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来自大学的薪金是学院派史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学教授的平均年收入在 1000 万日元上下<sup>①</sup>,属于中上层收入水平,只要完成本职工作,没有寻找副业的迫切需要。民间史家基本为自由职业者,虽不乏挂有大学名誉教授头衔者,但往往缺乏固定收入,著书的利润与出席节目的片酬构成其收入的主体。积极在电视露面,提高知名度可以直接提升著作的销量,与收入密切相关。因此,民间史家往往对电视节目的出演趋之若鹜。井泽元彦更是利用电视媒体的佼佼者,不但出演多档节目,而且拥有“历史发现”“日本史恶人们的真相”等以他为中心的历史节目。

在互联网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YouTube、NicoNico 等视频网站成为挑战电视媒体、吸引大众观众的新战场。在上述视频网站上发表自己的历史见解相对容易,门槛远低于电视与纸质出版物,因此逐渐成为尚不知名的民间史家新秀们展示自己的舞台。他们纷纷在这些网站上建立自己的频道,定期发表研究进展,特别注重与时事的关联,对熟悉网络媒体的年轻一代影响极大。京本和也、竹田恒泰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两人的频道均拥有庞大的视听者群体。京本和也的固定收听者超过 30 万,竹田恒泰的固定收听者超过 10 万<sup>②</sup>。视听者可以对每一段视频进行评论,民间史家们往往利用这一机制,解答各种疑问,与视听者展开观点交流,甚至历史辩论。这大大缩短了民众与史家间的距离,形成了民间史家的“亲民”形象。

在电视、网络媒体的帮助下,民间史家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展到各个年龄、社会阶层。对一般民众而言,无论是政府审定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名牌大学的历史教授的演讲,都不如民间史家的言论易懂可信。可以说,民间史家对民众历史认识的影响远超过了政府审核的教科书。

第三,综合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地对历史事件展开宏观分析是民间史家的突出特征。他们不仅陈述历史事实,更注重剖析前因后果与历史影响,注重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不可否认,民间史家的史料解读与史料批判能力弱于学院派史家。为了扬长避短,民间史家往往选择宏观把握历史,以弥补细微考证之不足。然而,民间史家的研究对象并不宏大抽象,一部作品只研究某个历史问题,保持着细致入微的研究风格。但是在分析问题时,民间史家往往旁征博引,不但从世界史的视角观察日本史,而且时常展开跨学科、跨领域的思考。关裕二在分析奈良、飞鸟时代的宫廷政争时,往往会将宗教学方法代入其中<sup>③</sup>;稻垣史生的江户史研究大量导入社会学研究方法<sup>④</sup>。井泽元彦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需要引入“常识”作为评判历史、甚至史料可信度的标准。“常识”一词的涵盖面极广,涉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合乎“常识”并非单指现代人的常识,而且要在广泛阅读史料的基础上,总结“历史上的常识”<sup>⑤</sup>,拓展了年鉴学派心性史的研究外延。

井泽元彦所提出的符合“常识”,实质上是对司马辽太郎所弘扬的“理性主义”的通俗化解释,可以

① 文部科学省:《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法人及特殊法人の员工報酬及薪水标准一览表(平成 26 年度)》(文部科学省,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法人等及び特殊法人の役員の報酬等及び職員の給与の水準一覧(平成 26 年度)),[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7/06/attach/1359357.htm](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7/06/attach/1359357.htm),2015 年 6 月/2016 年 10 月 30 日。

② Youtube Follower 数统计,<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qbj7zpxAx2BxPx-xmx6g>,2016 年 10 月 31 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

③ 关裕二:《谋略女帝持统天皇挑战古代正史》(関裕二,謀略の女帝持統天皇古代正史への挑戦状),大阪:footwork 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 稻垣史生:《考证战国武家事典》(稲垣史生,考証戦国武家事典),东京:新人物往来社 1992 年版。

⑤ 井泽元彦:《“常识”的日本史》(井沢元彦,「常識」の日本史),京都:PHP 研究所 2009 年版,第 9~12 页。



理解为历史结论需要“合理”。从皇国史观盛行时代开始,学院派史家一直缺乏对历史进行合理化解释的能力。出于对战时历史研究的反思,战后的学院史家更是以实证主义为借口,避讳“说理”,自然无法“合理”。跨学科的宏观历史考察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实证主义传统,提高了历史观察的全面性,通过多学科方法的融合,使历史结论与历史规律更加符合“常识”,从而拥有更强的说服力,提高了史学研究的实用价值。一般读者往往愿意相信民间史家的历史观点,其极高的著作销量与电视出镜率就是最好的证明。

通过独辟蹊径的研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民间历史学家并不少见。高森明勅以皇室制度研究著称,被选为天皇退位问题有识者会成员;儿岛襄精通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开设私塾“历史研究会”,吸引了大批东京大学学生;盐野七生钻研希腊·罗马古典历史,在日本社会掀起了“西洋古典热”;谷口克广终生以织田信长为研究对象,从各个角度解读织田信长,相关著述多达20余册;林美一以美术史为主攻对象,将学院史学敬而远之的“春宫图”作为研究对象,开启了江户美术史研究新天地。民间史家们往往扎根于学院派史学不曾或不屑涉足的领域,通过独特的视野与见解,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

第四,民间史家的历史研究坚持以读者为中心,从选题到问题都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文章通俗易懂。由于民间史家大多是作家、记者出身,比纯粹的历史研究者拥有更好的写作才能,能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解释复杂的历史问题。井泽元彦的《“常识”视角下的日本史》一书在解释逻辑性较强的历史问题时,往往使用现代日本人耳熟能详的事物进行比喻,将历史翻译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在讨论《日本书纪》的真实性时,他反问道:“你能完全相信企业创始人的亲信所编纂的企业史吗?”在讨论足利义满猝死问题时,他质疑道:“你相信某个资本家明知自己死期将至却不留下任何遗言吗?”贴近生活的比喻缩短了历史与现代的距离,使得缺乏历史背景知识的人也能一窥历史的奥秘。

众多学院派史家攻击民间史家的著作中通篇没有引文与注释,是不注重资料的信口雌黄,实际上并非如此。民间史家并没有因为追求文章流畅易读而轻视史料,他们对史料的引用同样贯彻着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以井泽元彦的《逆说日本史》系列为例,井泽对史料的引用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将史料原文全部引用在正文处,在引文末尾标记出处,有时会存在出版物信息不全的状况。其次,为史料加句读点,整理为“読み下し文”(较为接近现代日语的文体)。最后,翻译成现代日语,并在译文处标记重点。此种引用方法无疑与主流学界格格不入,显得非常不正规,但却与文章浑然一体,照顾到不了解相关史实或无法直接阅读史料的读者。即便对有能力强独立解读史料的读者来说,这种引用方法也提供了检验解读正确与否的机会。

深入浅出的例证、流畅的笔触与易于接受的史料引用方式,为民间史家赢得了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扩大了影响广度。

#### 四 史家责任的重塑与日本历史学研究的未来

日本之所以会形成“民间史家”队伍,是因为学院派史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存在诸多明显缺陷。学院派史家沉迷于学究式的历史探索中,不单放弃了向民众普及历史知识、塑造正确历史观的“普世”职责,更是逃避了经世致用,充当政府智库的责任。当供给方无法满足弥补消费方需求时,就会出现新的供给源填补空白,这是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学院派史学家的固有缺陷导致历史知识市场供不应求,民间史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虽然民间史家起源于历史小说家,但吉村昭与司马辽太郎两大巨匠将历史小说创作提升到了历史研究高度,分别开创了追求真实的“记录小说”与宏观评判历史的“司马史观”,为此后的民间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民间史家行走在吉村昭和司马辽太郎这两条轨道之间,不断挑战禁锢日本史学界的实证主义,坚持以读者为本,综合多学科知识,在细致入微的历史事实分析之上,敢于宏观地批判历史,在“普世”与“经世致用”上走得比学院派史家更快更远。他们在各种媒体上掌握了话语权,对民众甚至政府的影响力已超过学院派史家。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民间史家的影响。

虽然民间史家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可取之处,但日本史学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却并不会是由民间史

家彻底取代学院派史家。虽然学院派史家对民间史家的抨击时有偏激,但民间史家队伍确实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民间史家追求著作销量,过度逢迎读者需求,导致研究方向高度集中。对于“赤穗藩浪人事件”“新选组”等热门历史事件,每年都会有大量相关著作问世,但相对冷门的历史问题则少有人问津,造成了研究课题分布不均,浪费了研究资源。其次,民间史家中右翼史家居多,能够客观评价历史的史家处于劣势。这一倾向与近年日本全民的右倾化趋势互成因果,右翼史家的史观影响了民众,而民众更希望阅读符合自己史观的右倾化史书,成为滋养右翼史家的温床。右倾倾向在以网络媒体为主舞台的青年民间史家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往往激烈抨击反思战争责任的学院派史观,称其为“自虐史观”,满足了日本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加速了青年一代的右倾化。最后,民间史家缺乏研究团队意识,通常是独立进行个人研究,缺乏横向配合的能力。因此,民间史家的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团队性,无法形成课题组式的项目研究,更没有以解决某一国家战略问题的综合性研究,限制了其上升为政府智库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学院派史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民间史家在日本的胜利并不值得庆幸,学院派史家也并非全部放弃了与民间史家争夺历史领域的话语权。以矶田道史为代表的学院派年轻学者已经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积极出席电视节目,撰写普及性读物,在保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前提下,与民间史家展开话语权争夺。其著作《武士的家用帐》不仅成为畅销书,而且被改编成电影,深入人心。但除了矶田等少数几位学者之外,大部分学院派史家仍然没有意识到民间史家的挑战与改变自身的必要性。

从现状来看,学院派史家与民间史家的研究风格如能融合,兼顾求真、普世、济用,则可形成较为理想的史学研究发展模式。无论是学院派史家还是民间史家都需要弥补自己的缺陷,在竞争中互相促进,在互补中缩小彼此的差异。而改进的核心目标,无疑应当是承担起历史学家应尽的责任:求真普世、学以致用。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史学方法的发展均应为史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职责服务。无论来自大学还是民间,是否能真正承担起史家责任,不但是评判历史研究者个人成绩的重要标准,更是评价一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核心原则。

收稿日期 2016-11-25

作者丁诺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 The Japanese Positivism History's Dilemma and Way Out On the Civilian Historians' Challenge and the Duty of Historiography

Ding Nuozhou

**Abstract:** The Japanese academic historians have kept the rules of positivism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However, the positivism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had already faced its own limitation; the academic historians can't fulfill their duty due to this reason. To mend this defect, the historian out of academic world has come into power. Their style of research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t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ian, gradually taking over the place of the academic historians, controlling the right of speech on the history-field, making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civilians' history opinion. Neither the academic historians nor the historians outside the academic world are perfect, though both of them can build a grace future of the Japanese history research through learning each other's advantages. The only goal of all kinds of improvement should be fulfill the duty of historians, namely 'seeking the truth', 'sharing knowledge with the civilians' and 'using the history's wisdom to save the world.'

**Keywords:** Japan; historian out of academic wor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ians; positivism

【责任编辑 李振宏】